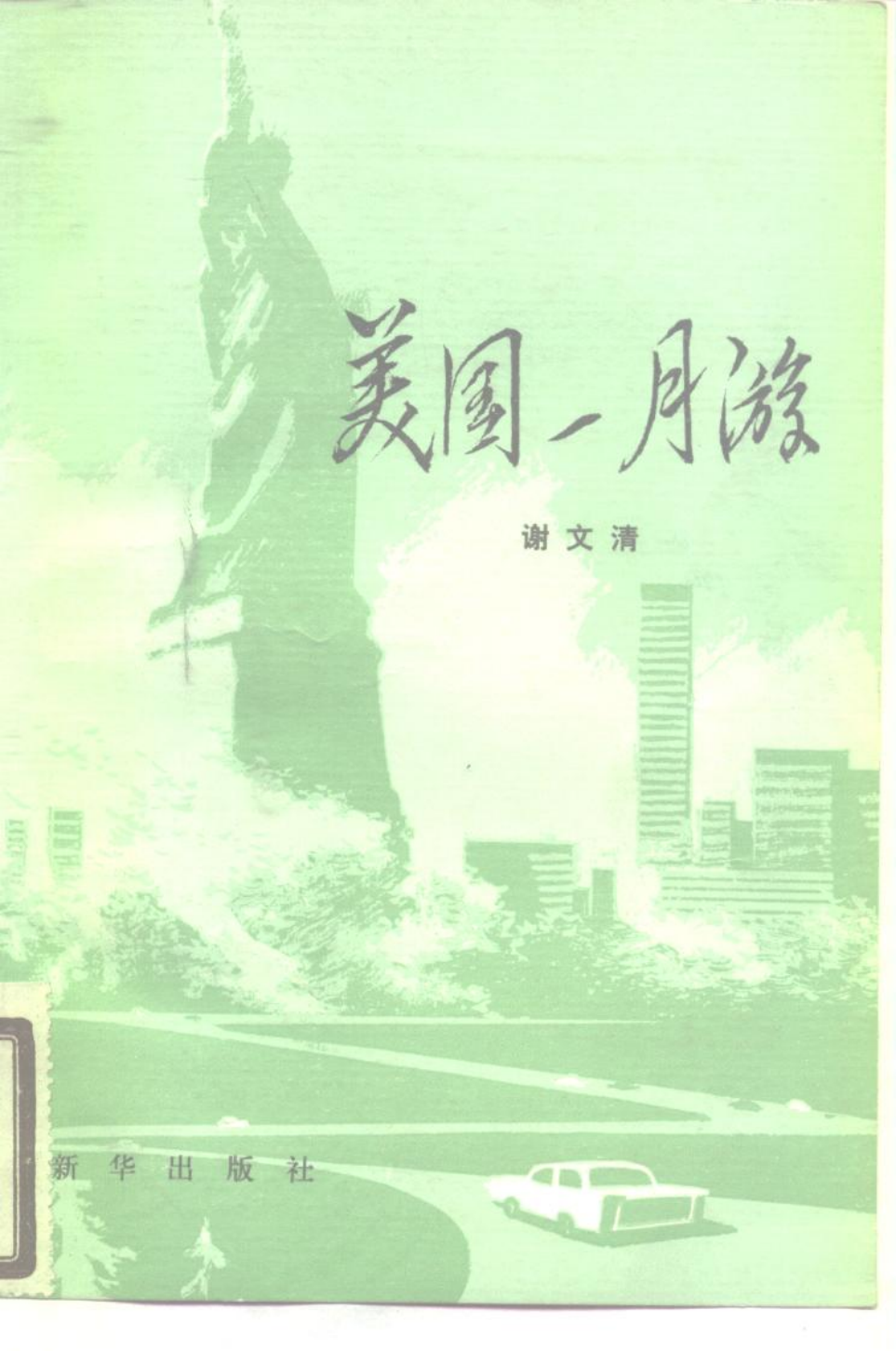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国一月游

谢文清

新华出版社

K971.29/2

美国一月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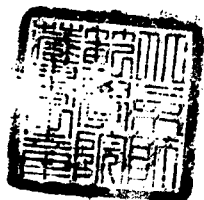
谢文清

12521/24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20866



新华出版社

920866

美国一月游

谢文清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62,000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3,500册

统一书号：7203·039 定价：0.33元

002150



目 录

开头语.....	(1)
(一) 有朋自远方来.....	(3)
(二) 美国的“十多”.....	(14)
(三) 美国社会掠影.....	(32)
(四) 共度独立日.....	(56)
(五) 在华盛顿和纽约市.....	(63)
(六) 农村一周.....	(72)
(七) “三叉口”上话“牛仔”.....	(85)
(八) 忧心.....	(93)

开 头 语

应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盛情邀请，我有机会在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五日大约一个月期间，在美国参观访问。现在就把我在参观中所看到的、听到的和想到的东西，都记述下来，其中并没有什么奇闻趣事，更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新的发现。所记的都是些美国的社会风尚、乡土人情等小事。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，就如摆一个街头地摊，有几件零星的破旧物品，也许有人能从这个小摊上发现一星半点对他有用的物件。果如此，也就足可聊以自慰了。

除了在蒙大拿州的包兹曼 (Bozeman) 市会见几名中国留学生外，这次访问的全部日程都是由主人安排的。离开香港之前，美国副总领事威廉思 (Richard Williams) 先生等曾征求过我的意见，问我有无什么特殊要求。到华盛顿后，美国国务院官员们也曾问我有无特殊要求。我想，还是“客随主便”较为顺礼，由主人去安排。再说，我实在也不懂什么专业知识，没有什么特殊要求。因此，我只是表示：自己是在农村生长的，喜欢看看农村风光和农业生产。所以主人就多安排了一些农村访问，这次访问中在农村呆的时间也就较

多一些。这是一次个人友好访问，为的是增进和传播中、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。临行前，威廉思先生特地请我看了美国小提琴家伊沙克·斯特恩（Isaac Stern）先生访华时拍的纪录片。斯特恩先生在中国访问时，每天同中国人民生活、工作在一起，并且向中国学生传授提琴技艺、共同探讨音乐知识，宾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情。威廉思先生表示希望我这次也能象斯特恩先生在中国一样，为中、美友谊作出点贡献。这当然是个十分友善的希望。但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，除了一只笨笔外，别无一技之长。因此，我唯一所能做的，就是把这次访问的实况追记下来，算是我这次执行友好使命的旅程所得。如能在中、美人民友谊的大厦上增添一砖半瓦，也就感到心安意顺了。

(一) 有朋自远方来

如果问我：“这次访问美国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？”那我可以毫不犹豫、也毫不夸张地回答说：“友谊！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着一股浓烈而深厚的友情！”。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回答太一般化，甚至说是“外交辞令”，但在我，却是亲身的感受和体会。这当然是“有事为证”的。

七月十九日，我和四位中国留学生由包兹曼市出发，开车去游“黄石公园”。这是个方圆数百公里的自然保护区，距包兹曼市大约有两百公里左右。在回程路上，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加油，大家也趁便下车活动活动。这时，还有别的汽车也在停车加油。我们几个中国人正聚在一起大声谈笑时，有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、身材高大的美国人朝我们走了过来，问我们“会不会讲英语”和“是不是中国人”。

“是啊，你猜得不错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！”研究生朱学渊先生用英文回答说。

“并且也懂点英文。”另一位中国学生陈星补充了一句。

“那好极啦！”这位美国朋友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名片，给了我一张，一面满面笑容地说：“我猜你们就是中国人。”

中国是个文明古国，有悠久的历史，我爱中国，很想同中国人认识，交几个中国朋友……阿哈，可惜我随身只有这一张名片了，我们交换好了！”

于是，我们就交谈了起来。从名片上看，这位中年人原来是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病理系教授，名叫大卫·杉兹（David Sands）。他说，他虽然没有去过中国，但却读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书。中国既古老，又年轻，正在实现现代化。而他是学科学的，可以助一臂之力——去中国教书。我们几个中国人当然只有表示欢迎和感谢他的热情和友好的心愿。这时，双方的汽车都已加好油，准备继续各自的路程了。可是，这位教授突然打开他的汽车后箱，提出一个透明的大塑料口袋。口袋里有四条大鱼，每条约有二斤多重。他拿出一条活鱼直往我的手中塞。这使我觉得有点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连忙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初次见面，怎好接受馈赠！”

“请莫介意，这鱼不是买来的，是我和我太太还有我弟弟今天在黄石公园湖中钓来的”。他说：“如是买来的鱼，我是不会送给你们的。自己钓来的，更能表达友情呀！”为防腐烂，塑料袋中还装了许多冰块。杉兹教授还十分幽默地说：“我们三个人，可是却有四条鱼，多了一条，正好遇见你们，请你们也分享一条。下余的我们每人一条。平均分配！”我们几个中国人都深为这种友情所感动。看来这鱼是非收下不可的了，盛情难却呀！

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，许多美国朋友都邀请

我去他们家中作客，有的干脆接我住在他们的家中。七月三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佛蒙特（Vermont）州的柏林顿（Burlington）市，我本来住在旅馆里。可是第二天，七月四日一清早，普洛克托·佩奇教授就驾汽车把我接到他在郊区的家中去住。“走吧，听说是远方来的朋友，去我家住两天。我太太很希望中国朋友来我们家看看。我家在郊区，空气清新，也很安静！”这位六十岁的老教授与我同龄，我们可说是“一见如故”。他开车，我坐在他身旁，就到了他的家中住下了。据美国国务院陪同我访问并兼作翻译的波乌·科维诺克（Paul Covenock）先生（中文姓名叫柯逸山）告诉我：在美国，当主人开车接你时，最好坐在前排，同主人坐在一块，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。因为，在美国除计程车和公共汽车外，小汽车大都是私人车，自己开车，极少有人雇用司机的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们就到了佩奇先生家中。这天是七月四日，美国独立日。佩奇夫人已为我们预备了节日早餐。佩奇夫人是美国种菜者协会的积极分子，又是《大家都来种菜》报《Gardens for all》的主编，特别爱吃蔬菜。她也知道中国人爱吃蔬菜，所以每顿饭蔬菜都很多，而且都是他们夫妇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。她还拿出一口中国炒菜锅说，买来后从来没曾使用过，因为不知如何用法。美国的炒菜锅全是平底，而中国的则是深底，而且越往下越小，她不会用。她还请我做个中国菜，以便给这节日餐桌上增添一点东方风味。可惜我只会吃菜而不会做菜。如果要做，也只能炒个鸡蛋罢了，那也只能说是个“中国人做的菜”，而不是什么

“中国菜”。在佩奇先生家中住的两天中，我们结下了深深的友情。我们一起参观博物馆，游览公园，还在七月五日参加了美国独立日游行。本来，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日，但因今年七月四日是星期日，所以就改在五日游行庆祝。我们还在黄昏时分在紧靠加拿大的查普伦湖（Champlain）中驾舟漂游。这里风光秀丽，湖水清澈，两旁山上苍翠碧绿，湖边幢幢别墅式民房都掩映在绿树丛中，隐约可见。晴空万里，水光接天，微风吹拂，湖面如鳞，晚霞映照，余晖耀眼。很有点苏轼《前赤壁赋》中所描述的长江景色，使人有“羽化登仙”之感。但我远无苏轼老先生的文学才能，也没有他游赤壁时乐观中所流露出来的忧愁。因此也缺乏“灵感”，更不能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，所以也不去进一步描述和抒发游湖时的感慨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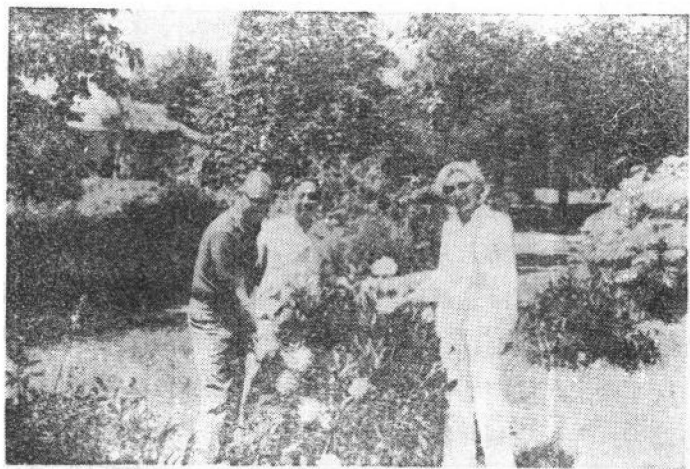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四日晚间，佩奇夫妇带我去“走亲戚”——去三十多公里外他们的女儿家吃晚饭。女儿和女婿都是新闻界人士，所以我们谈得十分热烈。两位青年人和他们的两位青年同事都十分关心中国的情况，问题一个接一个地给我提了出来，我只得尽自己所知介绍些新中国的情况。后来，三个多小时的“走亲戚”快要结束时，佩奇小姐才发现问题提得太多了。她说：“本是谢先生访问我们美国，应先由客人提问，可是我们今天却‘喧主夺宾’给客人提了一大串问题。”她的丈夫也有同感，并表示歉意。但思索了片刻后他接过来：“这可以补救的。明天晚上我们也去‘走亲戚’——回拜一趟，让谢先生就多向我们提些问题，我们谁也不准再提

问题，好不好呢？”经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好主意，就这么办吧！”佩奇先生采纳了女婿的建议，宾主互道“晚安”，尽欢而别。

七月五日，午前我们开车去韦利斯顿（Wiliston）小镇参加美国独立日游行（因今年七月四日是星期日，所以“独立日”活动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，后文另叙）回家后吃过午饭，佩奇先生说：“这最后一个下午，我们应来一个更有纪念价值的活动。”他提议到菜园里下田干活。并幽默地说：“咱们玩了两天，菜园的活没人干，趁你告别之前，我要利用你的劳动力！”我立刻回答说：“响应号召。”于是，我们四人，佩奇夫妇，柯逸山先生和我，就各自扛起锄头直奔菜园，去田里锄草、间苗。这菜园距住宅很近，只有百多米，约有半亩地，种的是白菜、胡萝卜、番茄、葱头、草莓和玉米等。我们虽然只干了约两个小时的活，但因正是盛夏，太阳直射，所以倒也真的流下了几滴汗。柯逸山先生也开玩笑说：“谢先生今天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下放劳动了！”我说：“我本是农民出身，下放劳动对我倒是挺适合的。”佩奇先生还表扬了我一句：“从你干活的样子，可以看出你确实是干过农活的。”佩奇夫人也说：“中国人、美国人，在美国土地上一块儿干活，一同流汗，种下友谊的种子！”在田边上，有几株盛开的牡丹花。佩奇夫人说，这花是用从中国移来的花种栽培的。于是我们就在这牡丹花前拍照留念。

这天晚上，佩奇先生的女儿、女婿果然来“回拜”，并



1982年7月5日同普罗克托·佩奇先生夫妇在
他们栽培的中国牡丹花前合影留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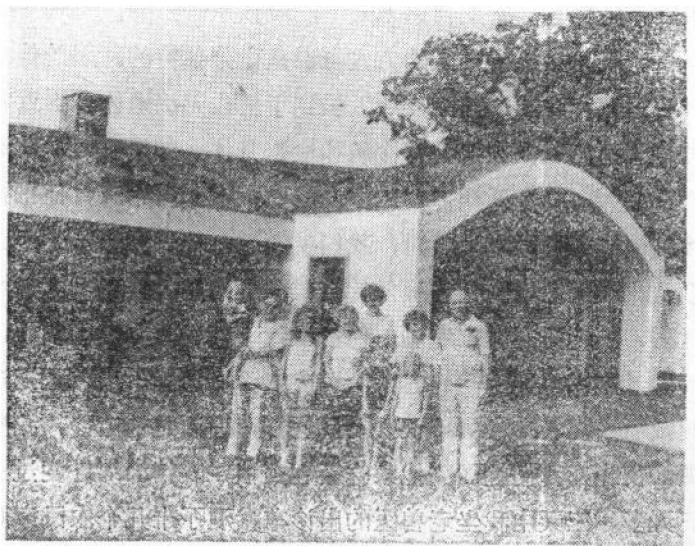
且把他们的三岁小闺女也抱来了，说是要让下一代也续上这一段友情。我们从中美两国的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饮食一直谈到中、美关系中当前存在的问题。大家畅谈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，时时举杯祝贺中美友谊的发展。

在荻·劳森 (D. Rowson) 博士的家中度过的四天，更是充满了友情。劳森先生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兽医博士，住在伊利诺斯州洛克福尔县的农村。他从县旅行社得知有中国人来访时，就要求把客人接到家中住几天。他同夫人今年四月刚访问过中国，在中国时得到过很好的接待，所以他们定要在家中接待我这个中国客人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听到了这句中国古话。现在，中国人到了

美国，同样是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应该乐一乐的。

劳森先生接待客人的方式可说是十分独特的。因为他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老兽医，所以虽到年龄也无法退休。附近农民每天都等着他去给牲畜诊病和检查身体。如果陪我游逛三、四天，就会延误许多工作。因此，在七月十三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一同吃晚饭时，我们就商定：他每天依旧开车出诊，我和柯逸山先生就坐他的汽车参观访问。他到哪家农场行医，我就访问那家农场。他借给我一套兽医服装和帽子，我们就这样每天巡回到各家农场去出诊和访问。老兽医把这叫做“参观、出诊两不误”。就这样，白天是他出诊，我参观，夜晚，我们就回到他家吃饭、交谈，友情绵绵地度过了三天多。三天中我坐老兽医的出诊车参观了十几个农民家庭和他们的农场、畜牧场等。这位老兽医博士对中国农村生活情调十分称道，并且不时模仿。他从衣橱中取出一件浅灰色涤纶中山装和解放帽，穿戴起来陪我在庭前散步。劳森夫人则取出中国茶壶，泡上一壶中国龙井茶，穿上一件中国造的绣花衣，还拿出几件在中国购买的手工艺品摆在玻璃柜中。书桌上还摆有《北京周报》，这就使我好象生活在一个中国家庭中。劳森夫人说：“我们喜欢中国人朴实清静的生活，不喜欢城市中噪嚷繁闹的生活。我们就住在这偏僻的乡村二十多年了，很少进城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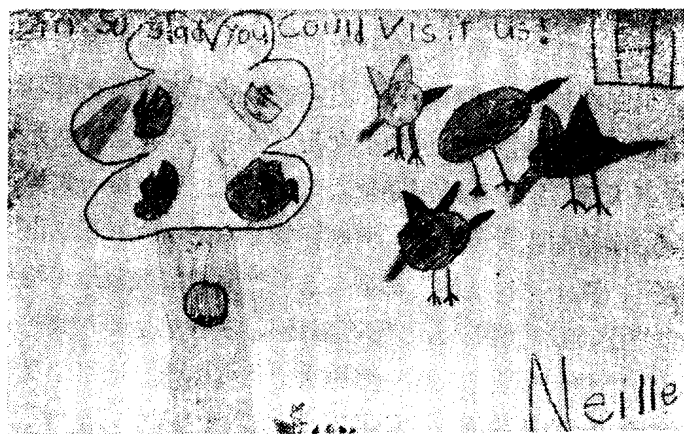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十七日下午，我和劳森夫妇也一同开汽车去“走亲戚”——去五十多公里外探望他们的女儿、女婿和四个外甥、外甥女。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充满温暖友情的“走亲戚”。



1982年7月15日在劳森博士女儿家，同他的女儿、女婿和四个外孙、外孙女以及劳森夫人合影留念。作者抱的就是他最小的外孙女哈丽。

当我们下午三时在门前下车时，四个活蹦乱跳的娃娃立刻围住车门来迎接。一男三女。老大是姑娘，大约有七、八岁了，老二是个男孩，约五岁，老三又是个姑娘，约三岁，老四还是姑娘，最多两岁。象这样的多子女家庭在美国是极为少见的。柯逸山先生说：“瞧，真是中国人所说的‘黄毛丫头’！都是黄头发。”劳森先生的女儿、女婿也都出来迎接客人，他们指着四个娃娃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仪仗队，请你检阅。”我说：“赤脚、短裤、背心，洋娃娃仪仗队，太奇特、又太可

爱啦！”参观过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书房和卫生间后，大家围坐在桌旁交谈，孩子们端上水果和点心。那最小的两岁的哈丽就坐在我怀中，还不断拿葡萄给我吃。话题谈到了中美友谊时，大家都认为今天的友好会见应留下某种足以纪念的物品。我们就在门前拍照片，我还送给他们四人一件“大熊猫”织锦画。这时，四个“洋娃娃”交头接耳一合计，决定送画给我，每人当场作画一张。只见他们立即拿出五色铅笔，铺开纸张开始作画。大姐艾菲（Effe）的画比较明快，画的是他家住宅的外貌，标题是“欢迎来我们家访问！”老二波澳（Beau）画的就是他们的“家庭仪仗队”——六个人手拉手排成行迎接客人，标题是“欢迎访问美国！”，并且



这是劳森先生的外孙女，三岁的妮丽赠送给作者的一幅画，是她当场画出来的，标题是“我非常高兴你能访问我们！”。

在六个人头上写明“爸”、“妈”、“艾菲”、“波澳”、“妮丽”和“哈丽”；老三妮丽画的是四只小鸟，表示是他们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四人在唱着歌儿欢迎客人。一旁还画有四只刚刚从蛋壳中伸出头来的小鸡，标题是：“我们非常高兴你到我们家来作客！”。唯有两岁的哈丽的画最难懂。这个小妞妞积极性还最高，先画了一张，她爸爸、妈妈和姐姐、哥哥都说看不懂，她外公、外婆也说看不懂，我和柯逸山先生同样看不懂。但小哈丽有点不服气，立刻又提笔画了一张，大家细看第一张时，只见在上方有一个红色圆圈，周围还有光线四射，大家都说，这是太阳无疑了。其它就是五颜六色，涂抹得一片混乱。再看第二张，还是各种颜色和线条的胡乱飞舞，谁也看不出画的是什么，但却有几个方格，有的象汉字的“田”字，有的象似“由”字。两张画都无标题，但却有签名：“哈丽”。当大家都说看不懂画意时，还是哈丽的爸爸最了解自己的小女儿。他说：“我这小女儿是抽象派大师，抽象派的画是越看不懂越好！”说得大家捧腹大笑。小哈丽也十分得意，但她好象并不明白大家在议论她的大作。四个“洋娃娃”都把自己的作品恭恭敬敬地送给我留作纪念。我对他们说：“珍品名画，我自然是要珍藏起来的！”但他们也要求我画一张画送给他们留念。这可把我给难住了，因为我的绘画才能并不比小哈丽高明，连“抽象派”的作品也拿不出来的。当我正在发愁之际，还是艾菲最聪明，她给我解了围。她建议我用汉字把他们四姐弟的姓名写下来，每人写一张纸留作纪念。我立刻就拍拍胸脯说：“这

个我做不到！咱们就这么办吧！”于是我就把四个孩子的姓名用汉字分写在四张纸上。他们拿去细看了一阵，谁也分不出上下，有的竟拿颠倒了。老兽医打趣说：“又一个抽象派画家的作品！”我一想，这话也可能有几分道理，因为汉字中有些字本是象形字，劳森夫人说得更为得体：“抽象派也好，印象派也罢，都要保存好，作为中、美友谊的纪念品代代相传下去！”四个孩子还各人都有一个骨头刻的中文印章，是他们的外公、外婆在中国访问时为他们带回来的，他们都在我写的汉字姓名下按上了红色汉字印章。一个个高兴得又蹦又跳。这时，小妮丽突然问道：“中国在哪儿？有多远？怎么去？”她外公告诉她：“中国在美国的另一面，远得很，你要长上翅膀才能飞得到！”她妈妈告诉她：假若从中国和美国各打一个井，在地球中心会合，路程就能近许多。大家都说，那好，打好井，安上电梯，两国人民就可坐电梯来往旅游了！

临别时，小妮丽和小哈丽又钻进汽车同我吻别，柯逸山先生在汽车开动后对我说：“你看，美国小孩对中国有多么纯真的友情！今后两国人民交往越多，友情就越深。人民越友好，对官方的友好也会有促进作用的。”